

目录

孔祥熙徇私枉法
段氏认爹曹锟拜爷
蒋介石下野，谷正刚哭丧
张敬尧升迁还靠“袁师母”
张作霖“曲径通幽”曾夫人
高秉坊判而不办奴才保命
戴雨农获上恩宠权势高
蒋介石两手政治
陈果夫称病留余地
临危受命杜聿明要条件
杜月笙“虎”头拍蝇
孙殿英四处行贿
徐世昌借调停坐利当总统
蒋介石攘外先安内的悲剧
蒋介石遥控派系相争
白崇禧玩转陆荣廷
袁世凯故意泄密熊希龄
齐燮元巧妙利用得督军
孔祥熙喜怒无常难捉摸
胡雪岩培植一棵大树
胡雪岩因恩得报
给别人面子，留自己财路
袁世凯用计收买人心
蒋介石施小惠，将士们报大恩
张作霖的感情投资
蒋介石独裁，汪精卫叛变
蒋介石知遇陈果夫
陈明仁心高气傲遭蒋击
孔祥熙贪污旧中国第一
韩复榘反叛被杀
张敬尧卖国，白世雄除奸
陈恭澎“以儆效尤”杀吉鸿昌
戴笠偏挥背后刀
吴国桢拒绝合作遭厄运
段祺瑞结党，袁世凯拆桥
赵恒惕升官，谭延闿下野
毛人凤代人受过终升官
丧权辱国只为博人欢
丧尽天良屠杀麻疯病人
莫希德替罪，余汉谋施计
戴颂仪庇护特务横行无法
蒋中正不思抗日被捕

莫须有张超施暗杀
张绍曾官场失意
叶琢堂潦倒一时得恩典
官官相连通，电文解忧顾
学良受禁苦，治中屡求情
戴笠当官得意须顾牵
袁世凯假考试，冯国璋真提拔
韩复榘受贿
蒋介石笑里藏刀
明赠乌纱帽，暗中造矛盾

正文

孔祥熙徇私枉法

抗日战争后期，几位爱国人士将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全部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国民参政员，并写出提案，准备请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送请国民政府严办。

孔祥熙得此消息，坐卧不安，预感大难即将来临。

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世杰急忙出面解围。王世杰劝说参政员：“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亲者痛。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提案人、联署人(大会规定，提案须有5人以上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以及大会信誉，都会有损。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

可参政员们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参政员们说：“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坚持要在参政会上提出。

王世杰慌了，向侍从室报告。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知道孔祥熙贪污肯定是事实，参政员们绝不会无事生非。于是，他向蒋介石报告：“蒋先生，参政员提案，庸之先生鲸吞美金公债。此事言之确凿，恐对庸之先生大大不利。”

此时，监察院长于右任也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

蒋介石听到陈布雷的报告，叹了一口气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职，所吞美券只好分期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将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布雷先生，我看你是不是以新闻界前辈身份给参政员说一说这种利害关系，就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送给我办好了。”

经蒋介石这么一说，陈布雷只好去访问参政员陈赓雅。陈布雷一开口就表示自己不是以侍从室二处主任身份来访，是以老报人的身份来随便谈谈。

陈布雷对陈赓雅说：“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提出讨论，当然也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

陈赓雅问：“敢问布雷先生，何以见得会投鼠忌器？”

陈布雷说：“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美、英、苏等友邦更会认为我们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后果之大，将不堪设想。”

偏偏陈赓雅对这番话不大相信。

陈布雷只得继续说：“前此不久，政府决定黄金加价，被财政部高秉坊泄露，掀起轩然大波，友邦朝野人士，啧有烦言。现在不幸又另有一空前大舞弊案发生，必然会引起友邦的更大失望与不满，为抗战招致‘失道寡助’的后果，想来也不是大家所愿望的。”

陈赓雅知道陈布雷是来为孔祥熙充当“说客”的，也明白这番话决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便问道：“陈先生，那么尊意以为如何办？难道眼看此等人大发国难财？”

“我想可以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人亲手交蒋主席查办，蒋主席是会严办的，这样既可达到查办目的，也可以照顾到影响。”

可是，参议员们还是不肯罢休，有的说：“不列议案也好，找另一个方式，戳他一下。”

于是，在1945年2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一个“质询案”，这立即轰动了大会。

但是，“质询案”的原稿立即被蒋介石的侍从室拿去，说是蒋介石要提前看。这样，大会秘书处便无从补印文件，大会也无法再进行了。此后，新闻舆论进行封锁，孔祥熙贪污的案情始终未能公开，社会上便无法了解其内幕了。

但是，孔祥熙所贪污的美券，数字实在巨大得惊人，而且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有的是抄件，有的是像片，无法销毁和抵赖，蒋介石起初想袒护包庇，但因不断有人追问，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得在形式上委派俞鸿钧等人进行查办。孔祥熙等贪污犯虽然表示要“分期吐出”赃款。但究竟吐出了多少，就只有“天晓得”了。

段氏认爹曹锟拜爷

段芝贵，安徽合肥人，生于1869年。历任新建陆军营务处提调、参谋处督办、第三镇统制、黑龙江巡抚、武卫军总司令、察哈尔都统、湖北都督、督理东三省军务、京畿卫戍司令、陆军总长等职。

1896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段芝贵只不过是一个候补同知。

就在这一年，段芝贵主动结交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总文案阮忠枢，又通过阮忠枢结识了袁世凯，遂投往老袁麾下，却未得重用。

阮忠枢献计段芝贵：“老袁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贪色，只要向他进献美貌女子，就能讨得他的欢心，你就不愁没有出头之日了。”

于是段芝贵遍访天津城，以重金从天津平康里韩家班买得妓女柳三儿。然后，请来“名师”调教，琴棋书画都教会，又买了许多漂亮衣服，打扮得更加动人，通过阮忠枢牵线，送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一见柳三儿，风韵绝伦，果然是当代尤物。三儿眉挑目追，卖弄风骚。两人倾心，一见如故，柳三儿遂被袁世凯纳为四姨太。

袁世凯心中十分高兴，连连称赞段芝贵会办事。不到两天，袁世凯即发布命令，任段芝贵为营务处提调，管理所有新军的调动。

由于柳三儿的关系，袁世凯对段芝贵开始另眼看待，十分亲热。段芝贵为进一步攀援袁氏，每日早起，必至袁住所问安。

一天，老袁对段氏之行径戏语道：“我闻人子事父母，每晨必趋寝门问安，你非我儿，何必如此？”

段芝贵急忙趋前拜道说：“父母生我，公栽培我，两两比较，恩谊相同。如果大人您不嫌弃，我愿意作您的义儿。”

袁世凯觉得好笑，不由露出笑容。段芝贵以为老袁已承认，就马上拜倒在地，急呼：“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之一拜。”

袁世凯推辞不及，已受了四拜，只好认下这个干儿子。

有了袁世凯这个干爹，段芝贵从此得以飞黄腾达。

曹锟，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青年时代他曾经有过一段布贩的生涯，后来生意亏了本，只好投入淮军当兵。由于他粗通文墨，被选送入天津武备学堂。

1895 年，曹锟到了天津小站，协助袁世凯督练新军，被任命为右翼步队帮带。

为了巴结袁世凯，曹锟想尽了各种办法。

有一天，曹锟回到天津，与别人闲谈中听说宜兴埠那个地方有个御职提督，姓曹名克忠，人称“曹大帅”。“曹大帅”有权有势，曾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的拜把兄弟。

曹锟听在耳里，喜在心里，认定这是一个绝妙的信息，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它。

说干就干，曹锟首先花了些小钱，买通了曹克忠身边的随从，递上自己的名片，求见“曹大帅”。

那料曹克忠这人架子不小，曹锟那小小“帮带”的头衔根本不在他的眼里，拒不接见。

曹锟没有因为曹克忠不肯赏脸而灰心。回到住所后，花钱备了一份厚厚的礼物，再一次登门求见那位“大帅”。

恰巧这天曹克忠正生着病，曹锟虽然得蒙召见，但没谈上几句话，就被曹克忠以“身体不适”为由打发出门。

曹锟仍不死心，自思当年刘备为了求贤曾三顾诸葛亮的茅屋，自己既要攀结袁世凯何尝不可三顾“曹府”？振振精神，曹锟带着比第二次更重的礼物，第三次登门求见。

曹克忠不好拒绝，即让随从传他进来，打算很快地将他打发走。

曹克忠做梦也没想到，曹锟一见他就高声叫道：“爷爷在上，请受小孙曹锟一拜。”说完便咕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

曹克忠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得将曹锟搀起。

曹锟坐定后，满脸喜悦地对曹克忠说：“爷爷莫疑，我已经查过曹家家谱，您是爷爷辈，我是孙子辈，我理当叫您‘爷爷’。”

曹克忠搜尽脑海，却未能查出有那么一个叫“曹锟”的孙子，将信将疑。转眼一想，认一个族孙，自己当了爷爷，这个孙子又那么“孝顺”，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便高兴地说：“没想到我的辈份这么高啊！好，好！既然你已查过家谱，应该没错，我就认了你这个族孙了。”

说罢，便设宴摆酒，正式认孙。

从此，曹锟常来常往。有了这个爷爷，曹锟打通跟袁世凯的亲密关系。由于曹克忠说情，曹锟不断被提拔，由帮带升为统领，1907 年又以尽先补用副将的资格擢升为第三镇统制，成了袁世凯的亲信大员。

曹锟为了往上爬，情愿甘心当孙子。

蒋介石下野，谷正刚哭丧

古代官员善哭，现代的官员又如何？国民党中就有一个人善于抓住时机哭的高级官员，他的哭虽然有失男子汉的体统。但却哭出了后半生的官运。这个人叫谷正纲。

1949 年 1 月 21 日，国民党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为了苟延残喘，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下野，让李宗仁代总统，收拾败局。宣布下野时，在坐的有李宗仁、孙科、吴忠信、邵力子、谷正纲、蒋经国等人。

由于蒋介石的心情不好。他瘦削的脸上冷若冰霜，会场上的气氛也十分冰冷。蒋介石首先发言，他将自己与李宗仁的联名宣言拿出来，说什么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 21 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接着是蒋介石讲话，这位败军总统说：“时局十分严重，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涂炭；为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个人非引退不可。只要和平能够实现，人民得以安宁。我个人进退无关紧要”。

蒋介石的声音低沉无力，失去了平时训话时的高亢激昂，似乎有不尽的悲伤和无可奈何。

接着；张群念了蒋介石一篇文告。张群念完后，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人都感到十分压抑，沉默不语。每个人都在思考自己如何发言。

忽然有人放声大哭。大滴大滴的泪珠雨水似的洒在会场里。那哭声如死猪嚎叫，哭的在场人欲笑不敢，欲气又找不到借口。此人壕陶了几声，又放开嗓门大喊道：“总统不能下野，总统不能下野，总统啊……”。

此人是谁？CC派的少壮骨干谷正纲。

谷正纲满脸泪痕，不顾别人投去鄙责的目光，哭声不止。高声哭叫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总统不能走……”。

蒋介石冷冰冰的脸上有了些许暖意。心中想道：忠于我的人大有人在，在这危急关头，还有这样的忠心的部下，还有人敢出来为自己呐喊助威，真是难得，这样的人今后要重用。

蒋介石用眼角瞟了谷正纲一眼，满脸泪水的谷正纲并非是在演戏，而是发自内心的悲伤。蒋总统感慨万千，心中说道：真是一条汉子！

谷正纲嚎叫几声，原本沉重的会场骚动起来，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张群对蒋经国说：“这是一个忠通之士，难得的人才……”。

邵力子立即对孙科说：“可怜虫”！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自己，谷正纲选定了用“哭叫”来向总统表示自己对蒋氏家族是忠心耿耿的。所以他哭得十分伤心，看上去肝断肠裂，如丧妣。

谷正纲还没有表演完，他的弟弟也跟着叫嚷：“在这非常时机，发表这样的文告，不利于将士和人心的稳定，总统不能下野……”。

张道藩也声嘶力竭的叫喊道：“总统不能下野，总统下野对大局不利。我极力反对。”

谷正纲用哭来带头维护蒋介石的威信，虽然有失男子汉的尊严。但是，这一次“哭辩”却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他的后半生的官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蒋介石虽然十分感激谷正纲的哭诉，但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的感激之情不会溢于言表。等谷正纲之流充分表演之后，他才用低沉的语调说道：“我以领袖为人格作了决定，这件事不能再更改，我今天就要离开南京，政府的一切大小事移交李代总统处理”。

蒋介石下野虽然是做表面文章。但毕竟是离开了权力的中心。在官场如战场的激烈争斗中，谁也无法预测蒋介石是否会卷土重来，当时共军已经打下了北中国的半壁江山，美国政府已经对蒋总统失去了兴趣。这种时候，能够在中常委会上替蒋介石辩护，虽然有投机取巧的嫌疑，但也算难得。

谷正纲的哭，与众不同，他选择蒋介石暂时处于下风的关键时刻，用眼泪向蒋介石效忠，用泪水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足以使蒋介石一辈子都记住他。他的马屁拍得十分出色，十分妥贴。尽管很多正义君子会鄙视他的这种行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人格，是一种没有骨气的表演。但是，谷正纲却因为这一次“哭诉”而获得了蒋氏家族的重用。使他后半生在台湾的官场上如鱼得水。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不二，在蒋介石“下野”的第二天，谷正纲就辞职抗议，离开南京，不管李代总统同意与否。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发表了不少“蒋总统不能走”的言论。

人们对谷正纲的这一次“哭诉”很是不以为然，甚至连某些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要人也认为谷正纲的表演太露骨了。但谁也不曾预料谷正纲的这一次小丑似的“表演”却带来了后半生的飞黄腾达。

蒋介石兵败逃到台湾后，对国民党施行了大手术，首先是成立 15 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这 15 人都是蒋氏父子精心策划和安排的，清一色都是蒋氏心腹。许多元老、党棍、军阀、都一一落选，谷正纲却凭借那一次“哭诉”而当选。

1952 年 10 月，国民党召开“七大”，在蒋介石的提名下，谷正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此后连任 30 年之久，这在国民党的官场上是独一无二的。

他最初是投向汪精卫的怀抱，在汪精卫的栽培下，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汪精卫失势后，他又投入权力日盛的蒋介石的怀抱。蒋介石 1949 年 2 月的第三次下野，谷正纲明白李宗仁不过是走过场，于是他就用“哭”来表示忠心，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与谷正纲相反，那些正人君子到了台湾都没有好下场。国民党元老，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在谷正纲哭的同一天，要求蒋介石下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于是，这位老先生到了台湾后，丢了官职，晚年靠典卖借债度日，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命运更惨。

这位省主席只是在西子湖湖畔的楼上楼为蒋介石接风时，因为蒋介石没有胃口，陈仪说了一句“总统要拿得起放得下”，就激怒了蒋介石。一个月后被下野了的总统免职，然后被毛人凤秘密抓捕到台湾，1956 年被枪毙。

其它人呢？曾经打到延安的胡宗南到了台湾成了落水狗；小诸葛白崇禧被软禁；曾经权倾一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成为“道德整治会”的专家；一方诸侯阎锡山隐居在台北郊外的山上；宋子文流亡美国；孔祥熙带着宋霭龄在美国的别墅瑞安度晚年；陈果夫激流勇退，离开政界精心养病；陈立夫则到纽约去养“来克亨”鸡消遣残年……

这些国民党的元老、党棍、军阀、特务头子，在大陆时哪一个都比谷正纲地位显赫，但到了台湾后却都没有好下场。

张敬尧升迁还靠“袁师母”

张敬尧最初跟一个说书艺人学说书，在生活困难的时候还能耐住性子学说一段，后来看说书整天东跑西走很辛苦，就利用一个偶然的混进了北洋军队。

张敬尧虽胸无点墨，但耍嘴皮子却很有一套。凭着能说会道，投机钻营，很快由排长升为营长，但他还嫌不过瘾，竭力上爬。看到别人一年年高升，自己“岿然不动”，他十分心焦，搜索枯肠，想着咋钻袁世凯的门路。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意外获悉袁世凯的宠妾杨氏喜爱喝进口白兰地名酒，而且还是“海量”。这个消息，使他心花怒放，决心利用这一点敲开袁世凯的大门。再说杨氏这里，经常收到一箱箱不署名人送的“白兰地”，过了有半个月时间，她暗中查访，才知道是有个叫张敬尧的营长送的，自然十分欢喜，亲自召见。张敬尧一见面，即满口“师母长”、“师母短”，把个杨氏溜得如登青云，内心甚喜。

从此，张敬尧通过杨氏算是在袁世凯那里挂了号，几年后竟升为旅长。

张作霖“曲径通幽”曾夫人

张作霖一生充满惊险曲折，他出身草莽，却成了“东北王”，尔后曾西度入关，操纵北洋政府，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不可一世，可谓一代枭雄。

这位传奇恶匪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从“胡子”摇身而变为朝廷命官，这个转折是他巧用智谋，以“曲径通幽”实现的。

1900 年，张作霖虽才 25 岁，却已是东北土匪中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有一股不小的势力。这一年，清朝政府恢复了盛京将军曾祺的职务，让他回奉天收拾局势。张作霖看到中俄战争结束，继续当土匪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便想金盆洗手，归顺朝廷，寻个“正道”出身。

如何归顺呢？真直接告诉政府东北大员曾祺，说自己想洗心革面吗？曾祺会怎么想？会如何对待？他能相信还好，如若不信而借机将自己一网打尽，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况且，即便他能接纳自己的归顺，“胡子”的名声也是不好听的，可能他还会认为自己“匪气”十足，……。

思前想后，张作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自我推荐、自我吹捧法：先劫持曾祺夫人，好

生款待，然后再送还，让她在曾祺耳边吹枕头风，为自己说话。

宁武先生在《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一文中，描写了张作霖向手下弟兄宣布这一计划的情形。张作霖对众匪徒说：“你们也许听说了吧！奉天将军曾祺带家眷逃到锦州、义州一带好久，后来，他自己回到奉天，家眷就进关去了。听说前些日子已派人去把他的家眷接回奉天。现在，火车只通到沟帮子。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将来曾祺的家眷从此经过，我们要连人带物都给劫下来，但不准乱动，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关于这一点，必须同众兄弟讲清楚，违者就要以手枪相见。”

在这次计划里，由张作霖作好人，他的把子兄弟汤玉麟作歹徒。

辽西，秋高气爽。曾祺派去接家眷的四辆马车，在全副武装的兵丁保护下，大摇大摆地走着，车里不时地传出嬉笑声。

张作霖等待已久，一声令下，高粱地里蹦出一帮凶神恶煞，迅速扑向马车，几声枪响，护车兵部乖乖地交枪就擒。

一箱箱金珠宝被掀开，一捆捆绫罗绸缎被拿出，哈哈的笑声不绝于耳。一个土匪头子猛然掀开曾太太的马车帘子，色迷迷地看着她。

曾太太觉得大祸将临之际，忽闻外面有人扬声喝道：“哪个敢坏我张雨亭的规矩？”来人正是张作霖，他带着一队人走过来，大步来到曾太太马车前，惊讶万状地吼了起来：“汤玉麟，你有眼不识泰山，胆敢背着我私劫督军宝眷的车，我毙了你！”说完，“扑通”一声跪倒在马车前，连连赔罪：“我张雨亭的手下冒犯了督军夫人，真是罪该万死，请您息怒。”

眼见一切都完了，而今竟绝处逢生，曾太太真是又惊又喜，再细看张作霖，也觉惊异。过去听说奉天著名匪首张作霖，生得人高马大，凶悍无比，原为竟是一个儒雅温和，文质彬彬、颇具礼仪的二十六七岁青年，实在出乎意料。

曾太太正自惊异，又闻张作霖说：“我张雨亭是胡子不假，可我这络胡子有规矩。我专杀为富不仁者，从不准作践妇女。夫人，既是您的宝眷，我担保决不敢动您一丝一毫，车马箱笼，一概奉还。现在请夫人到屯中安歇，我要杀鸡宰羊摆酒为夫人压惊。”

曾太太见张作霖如此，不由放下心来。

谁知，曾太太到张作霖的驻地就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张作霖急忙派人请来当地名医徐子义为曾太太治病，并派人细心照料。

曾太太病情渐渐好转，对徐子义非常感激。殊不知徐子义早就受张作霖之托借机向曾太太讲张作霖的好话，说张作霖为了救她，如何力排众议，不怕得罪兄弟；又讲了好些张作霖行侠仗义的事。

其间，张作霖对曾太太一日三探，问寒问暖，殷勤备至。

曾太太对张作霖渐渐地好感日增。

徐子义乘机向曾太太进言：“张雨亭虽久困山林，却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早有弃暗投明，归顺朝廷之心，怎奈虽有报效社稷之志，却苦无人举荐。”

曾太太自恃：若真能招抚张作霖，定能使丈夫立一大功，也能为地方除一大害。便答应与张作霖谈谈。

张作霖仍然是大礼参拜曾太太，然后垂直站立。曾太太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高兴之余说道：“我原在省城，就听说绿林各帮与曾将军为难，特别是你的名声最大，这次路上巧逢，才知你识大义。听徐先生讲了你的心愿，我很同情你，我看你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而且又有这样一部分力量，假如你能很快地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我想，你一定会这样吧！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路平安到达奉天，我也一定保证向曾将军建议收编你们这部分力量为奉天效力，既有利于地方治军，你们也有了出路。你看这样好吗？”

张作霖需要的正是这番话，立即称谢，并说：“假使我张作霖能带弟兄们投奔曾将军麾下，为国效命，有生之日，决不会忘掉曾太太的大恩。”

曾太太病愈回归，张作霖将其箱物一一点清，又把她卫队的枪枝全部奉还，并亲自与手下护送到新民府。曾太太一行十分感动，临别拿出五铤纹银赏给张作霖部众。张婉言谢绝说：“只要有出头露面的一天，那就没齿难忘了！”

回到奉天，曾夫人向丈夫讲了路途经过和张作霖弃暗投明的心意，并大肆赞扬张作霖，说他温和儒雅，讲义气，知礼仪，不像一般的草莽土匪。曾祺对张作霖救自己家眷十分感动，于是向清政府禀明张作霖想接受招安的情况。征得清廷同意后，曾祺即命新民府曾韞把张作霖编为省防营。

不久，曾韞将张作霖一伙收编为新民巡防游击队，张作霖被委为管带官，从此结束了土匪生涯。

高秉坊判而不办奴才保命

高秉坊何许人也？此人系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一直是孔祥熙手下的总务“人才”和亲信。说起高秉坊，他和孔家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还在孔祥熙任实业部长时，高在实业部做总务司长，同时又是孔家的“总管”。孔的孩子每天上、下学校，都要总务司安排汽车接送，他们还经常到实业部各办公室内打骂吵闹。高自以为是孔多年部属，关系密切，摆出所谓家长式的面孔，在孩子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孩子们哭着回家，向宋蔼龄哭诉高秉坊打了他们的头。打孩子，欺老娘，属员犯长官，这还了得，经高秉坊多次赔礼请罪，事情表面上平息，实际上宋蔼龄还是忿忿不平。不久，孔祥熙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所有部内司、处长以上人员也草拟了名单，高秉坊又是名单上内定的总务司长，正等着跟孔祥熙走马上任。谁知好梦难圆，当拟定名单提交宋蔼龄审核时，宋对高秉坊的总务司长提出反对意见，说你（指孔祥熙）既然喜欢高秉坊，给高什么位置我不管，就是不能给高做总务司长。凭这几句话，高的总务司长吹了。孔祥熙在接任前夕，临时把赋税司长与总务司长姓名用笔勾转了一下。于是高秉坊迷迷糊糊地当上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深知官场的风云变化，通晓官场秘诀。他常私下对人说，政治上就是玩钱、玩人。有钱，才能兜得转；有人，才能捧得高。要钱要做得手脚干净，要人要有用处目的。这几句话，既是从孔祥熙那里学来的为政箴言，也是他自己在官场的亲身体会。

抗战中期，高秉坊主管财政部直接税署。为培植亲信，控制财政部所属各税务机构，他在重庆开办了一个“财政部税务人员训练班”，没想到，此班一开，即得罪了 CC 系首脑陈果夫。因为陈在当时国民党的中央，以“中央政治学校”为 CC 系干部培养所，作为把持政治之计，不但 CC 的嫡系要由此出身，就是高考及格人员，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后，也须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受半年的复训。这就好比是基督徒的洗礼一样，必须受了洗礼，才能认为是自己人。正因如此，陈果夫不容许高秉坊另设任何训练机构。

高秉坊自知不是陈果夫的对手，于是建议孔祥熙向最高当局提请派遣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兼任税务训练班训育主任。这个办法，不仅封住了陈果夫的口，而且刺痛了陈果夫的心。

桂永清是黄埔系的主要骨干，是得蒋介石信任的陆军中将，对 CC 是不大买账的。因此，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小小的兼差，而且干得很起劲。税训班初办无地址，桂永清就慨然让出他的孝陵卫总队部的一个课堂和几间营房，借给税训班使用。这真使陈果夫哭笑不得，只好干瞪眼睛生气。

1942 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命合并于直接税，统一征收，并由高秉坊统一接管。这一下使陈果夫更坐不住了。因当时在四川各地营业税分局中，有不少分局长是 CC 系的人，而现在，要将营业税合并于直接税，并由高秉坊接管，实际等于是都得向高交权、交钱。在这种情况下，CC 系不得不派员拜会高秉坊，要求高保留他们的六个分局长职务。但高以孔

祥熙为后台，却不买账，以接管为名，撤换了 CC 系六个分局长中的四个，另一个以不合格内调，实际只留任一个。这使陈果夫更火了，于是便寻机报复。

高秉坊的后台是孔祥熙，孔毕竟比陈高出一筹，所以，当孔在任时，CC 系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报复，只是利用中央政治学校培养的亲信，打入财政部，等待时机，图谋反击。1944 年，CC 系利用孔祥熙出访的机会，将早已收集的高秉坊贪污材料抛出，将其逮捕。不久，孔祥熙也因“黄金案”交卸财政部长。高秉坊的被捕和孔祥熙的下台，固然有其主观原因，但也同 CC 系的倾轧、排挤有关系。

在高案审讯过程中，法院屡次提出陈果夫控制的“中统”的调查材料作证，并根据陈果夫的意见，判高以死刑。法院对当时官场现实，自是揣摩功深，死刑是奉命判了，自有人出来转弯说项。因此，仅止于判，而未言及执行，留有余地，好看风使舵。果然，孔祥熙出来说情了。但高秉坊贪污也是事实，自己出来说话，实难于启齿，也不一定有效，于是便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项，婉言道高罪只是贪污，而判死刑有欠民主法度。蒋介石外表责孔以家事不当告诸外使，内心不敢不从赫尔利的说法。高秉坊则由赫尔利一言，救了他的一命，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

戴雨农获上恩宠权势高

在官场里，很少有“甘为人下”者。然而，在层层官僚机构中，每个部门都只能有一个“一把手”，绝大多数人注定只能做小人物。所以，即便不甘为人下，也只好甘为人下，或者说“暂时”甘为人下。

暂时甘为人下者称：“大丈夫能屈能伸”；甘为人下者也自有说词：“甘愿追随左右”。前者往往是“成者为王败者寇”，后者却往往由于“没有野心”，而随上司同步同趋。

民国官场中的戴笠便是甘愿做“小人物”的一个典型。

戴笠本名戴春风，字子佩，1896 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仙霞乡。1925 年进黄埔军校时改名为戴笠。发迹以后，为保高官厚禄，他相信算卦，请人算了几次都说他命中缺水，因此起字为“雨农”。

戴笠追随蒋介石 20 余年，一直从事特务工作，被其信徒称为“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

戴笠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始于 1927 年。这年 6 月，戴笠在黄埔军校骑兵团时，因借伙食采购之便贪污公款，引起同学公愤，被开除学籍。戴笠离开广州，来到上海，住在一个经营小生意的表哥张冠家里，晚上睡在地板上，还常遭表嫂的白眼。

8 月 13 日，蒋介石辞去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通电下野，回奉化慈溪小住后，抵达上海，准备赴日。戴笠听说蒋介石到了上海，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他每天都到蒋住所担任“警卫”并告诉蒋介石说：

“我是‘校长’的学生，来‘保卫’校长的安全。”

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十分感动，对戴笠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8 年 1 月 1 日，蒋介石重新登台，恢复总司令职务后，戴笠便做了蒋介石的一名侍卫。这时戴笠开始搜集情报报呈蒋介石。蒋以其情报颇有价值，对戴也刮目相看了。亲自召见戴，并发给他活动费每月 3000 元，约定由机要秘书毛庆祥代转情报。

1931 年 12 月，蒋介石再度下野回奉化溪口。戴笠秘密组织联络组，设总部于南京鸡鸣巷 53 号，继续为蒋介石提供情报。

1932 年 1 月，蒋介石返南京后，即向戴笠交代任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掌握情报，并向他保举了 6 个人。

没想到戴笠却说：“报告校长，我不能做这个工作。”

蒋介石奇怪中问：“为什么？”

戴笠立正身子说：“报告校长，情报工作本身不容易做好，您刚才所提的 6 个人中大多是我的老大哥，怕不好负责。”

蒋介石认定只有戴笠适合干这一行，便鼓励他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不能再推辞，当即回答：“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您是校长我是您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您是领袖，我是您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正是蒋介石的口头禅，戴笠很会讨其欢心。

3 月初，中华民族复兴社正式成立，蒋介石任社长，下设中央委员会干事，有干事 12 人，候补干事 3 人，戴笠被列为干事。

4 月 1 日，复兴社成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由此，戴笠开始组建正式的特务组织，以后迅速发迹。

1938 年，蒋介石为加强特务活动，将陈果夫、陈立夫的 CC 系特务组织与复兴社合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 CC 系为该局第一处；复兴系为第二处，处长戴笠。后来，二系分开，第二处扩大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对于军统局局长人选，蒋介石本意属戴笠。但又考虑到他资历浅，蒋怕一下超升，部下不服气，便指定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贺耀组为局长，以戴笠为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

从此，戴笠更是竭尽全力为蒋介石尽忠。在他的努力下，军统特务迅速渗透到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内政、军事、治安、交通各个领域，成为蒋介石洞悉各方最好的“耳目”和排斥、消灭异己势力最有力的鹰犬。

无孔不入、凌驾一切的军统特务，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内外各方人士的强烈不满。对此，戴笠十分清楚，他辩解说：

“一般反对党不满意我们，说中国要走向特务政治，走向独裁的道路。但我们看看，英国并非独裁国家，有没有特务？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有没有特务？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各有各的特务，总统有总统的特务，这都是战时的必然现象。

“中国是被压迫民族，是不是需要自卫？我们如果不能获得独立自由，有甚么资格同人家讲世界大同？我们在领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救国的工作，怕什么？我们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

“世界各国的特务工作，归纳起，大概不外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一种是要巩固本身的政权。前者对外，后者对内。中国亦不例外。我们要拿这个工作来整顿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跟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指日本）赌输赢。中国的特务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使命任务之下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根据领袖‘安内攘外’的政策要求来做的。而攘外尤其要先安内。

“有人以为，‘特务工作是不择手段的，阴谋越多越好。’不！我们始终把握两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因此，我们立身行事，一定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犹太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可是今天弄得无立足之处，请问钱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又如亡清末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很有钱，后来给人家拿去做背景，写成《九尾鱼》这部小说，遗臭万年。

“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旨意，体验领袖苦心’。我们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日本之所以兴盛，就是他们每个公民‘忠君爱国’。……”

可见，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是戴笠一切行为的准则，只要是蒋介石的“旨意”，不论是侦查、绑架、审讯，还是搜捕、暗杀，都是“从事革命救国的工作”。而唯蒋是从也正是戴

笠受蒋介石宠爱，步步高升的秘诀。

军统局成立不久，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在重庆召开。戴笠被蒋介石定为“中央委员”。当蒋找他谈话时，他慌忙报告说：“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

蒋介石一听非常奇怪，问他：“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戴笠的嘴巴最能讨蒋的欢心，他回答说：“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有望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介石笑了起来，欣慰之余，立即挥笔写了一个条子：

“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戴笠接过纸条，满面感激之情，却坚决推辞说：“感谢校长栽培，雨农愿终身作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中央高位请让给其它老大哥。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荣幸。”

蒋介石在赞许中，没再勉强他。

后来，1946年国民党召开六大时，蒋介石又圈定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定的还有郑介民和唐纵，戴笠再次坚辞不，做中委，而且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二人拉选票。

为什么这样做呢？戴笠告诉同仁说：“我为什么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生存于宇宙间，最意义的事；莫过于获得荣誉，只有荣誉，才是最高尚的。否则的话，无声无臭，不识不知，何异于禽兽？”

其实，在蒋介石身边红得发紫，拥有几乎凌驾一切的庞大特务系统的戴笠，还有什么必要去做中央委员呢？推辞不就，这正是戴笠与众不同的精明之处。无怪郑介民当选后会说：

“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正由于蒋介石对戴笠和军统宠爱，所以官场中人对戴笠及其军统特务往往都心存三分畏惧。当然也有对他们“不客气”的。陈仪杀张超便是其中一例。

张超是戴笠的心腹，军统局福建站副站长，公开职务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组组长。此人自恃戴笠权势，暗中发展武装力量，妄想称霸福建，不把福建省主席放在眼里，对福建省的工作，经常唱对台戏。煽动民众反对浙人（陈仪是浙江人）主闽，甚至到处张贴传单，揭露陈仪有“十大罪状”。其中有条说陈仪老婆古月芳是日本佬，陈仪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有汉奸之嫌，号召福建民众行动起来，驱逐陈仪，实行“闽人治闽”。

陈仪忍无可忍，秘令省警察局长李进德逮捕了张超，为防止戴笠闻讯营救，陈仪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不告知戴笠，直接请示蒋介石同意后，立即执行枪决！

戴笠救之不及，闻张超死讯，大怒失色。

军统要员被杀，颜面何存？他决心给张超报仇，即召毛人凤来商对策。

毛人凤对戴笠说：“陈仪杀张超，已跟我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但目前要想搞倒陈仪，我们还无能为力，眼下只有从陈仪的警察局长李进德头上先开刀。……且把枪决张超的责任全部压在李进德头上，你看如何？”

听完毛人凤的话，戴笠恨恨地说：“也只有如此，我马上要求校长电令陈仪用专机把李进德解押武汉，由我们审问严惩。待李一到武汉，立即扣人。”

戴笠随后便谒见蒋介石，向蒋呈上一份“报告”，诉说张超为军统服务一片丹心，竟含冤为李进德所杀，恳请蒋将李解押武汉，军法处置。

蒋介石收下报告，面对戴笠的自我哭诉，更加上宋美龄在一旁给戴笠帮腔，为了不让戴笠丢脸，应允了他。

然而，陈仪岂是任人摆布的无能之辈，他对蒋介石的命令固然不敢违抗，提早已考虑到与军统局戴老板周旋，首先要保护李进德的安全，才能稳操胜券。在押送李的飞机起飞之前，

陈仪即打电话给何应钦和张群，请何派专车将李接送到张群官邸，再由张群陪同李面呈蒋介石，澄清杀张超缘由。

武汉机场，戴笠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何应钦的专车将李进德载走。

戴笠正在责骂部下无能，蒋介石却派人将他召至眼前，迎头便骂：“你又是呈文、又是哭诉，口口声声为张超喊冤，张超有什么冤？他在福建反陈主席，铁证如山。你简直卑鄙无耻！”

原来，蒋介石听了李进德的报告，又亲眼看过张超在福建发展武装势力、张贴反陈仪标语的证据，觉得戴笠的这个心腹的确是“胡为”，该惩治。

挨蒋介石骂是习以为常的，但这一次，戴笠屈从，他立即跪下，对蒋申辩道：

“校长，学生无能，并非无耻。今天我如果是为了个人发财，跪在校长面前，可以说无耻。我今天跪在委座的面前，是为了请求委座给我们无辜被杀害的同志报仇！我们军统局的同志，为工作遭到不应有的牺牲，陈仪可以随便抓随便杀，若委座不给我们作主，以后我就无法再干下去了。我领导无方，现在请委座准予辞职！”

戴笠左一声校长，右一声委座，恃宠抗争，竟使蒋介石态度和缓下来。他对戴笠说：

“你想辞职吗？没有那么容易。你走了，我叫哪一位接替你呀？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接替你的人呢？起来，快快起来。”

谁知，戴笠却是一股傻劲，跪着死也不肯起来，又再次慷慨陈词道：

“报告校长，想校长必定还记得，24年(1935年)，台湾沦于日本40周年国耻纪念日，日本人通过福州领事，向陈仪发出观礼请柬，陈仪收请柬后请示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作何处置，汪精卫指示他以考察为名，作地方外交，不代表中央，陈仪果然率队赴日，恭敬于日本天皇裕仁画像前，鞠躬，拍掌，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岂不是无耻？今天，陈仪又杀了张超，我请求校长作主，校长如果不答应，学生就跪着不起来了。”

出乎蒋介石意料，戴笠竟然牵强附会、添油加醋地搬出了牛年马月的老黄历，他只好又开导戴笠说：

“陈仪的问题，不是一个陈仪，他是政学系首领之一，背后有武汉的张群，江西的熊式辉。当年在南昌行营剿共的时候，他们都出过大力气，帮过我的大忙，你千万要体谅我的苦心，我现在就下令撤销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职务，扣押对他继续审查。你回去要好好想一想，张超之事，以后不许再提了。”

蒋介石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戴笠也觉得不该再闹下去，不再言语。事情总算平息。

回到公馆，戴笠奋笔疾书：“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这几个大字从此成为他勉励部属，教育学生标榜自己的最好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春风得意的岁月也到了尽头。

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联合民主党派提，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方案，并一致要求取消特务机构。国民党一些元老不满于“军统”的飞扬跋扈，陈诚等一些军界要人也感到“军统”有损“党国形象”，一些地方派系则惧怕这只鹰犬咬人。所以纷纷向蒋介石提出特务机构过于庞大，应考虑取消或缩编。“军统”在抗战中，全靠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发国难财来维持，战后失去生财之道，这笔庞大的开支很令蒋介石头痛；更重要的是经过抗战，蒋介石的国际影响已使他稳居统治地位，所以也感到“军统”有缩编的必要。蒋遂令毛人凤急电戴笠从天津返重庆，研究对策。

戴笠接电后，怒气冲冲，拍着胸膛对其亲信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乱，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在这种时候还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你为我拟一复电，说我正在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大，无人可代理，请宽限半月，再返渝面陈一切。”

二人商议决定：为对付国民党内的攻击，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出国考察，以渡难关。

在公开场合，戴笠极力为自己及军统申辩，1946年3月10日，在北平怀仁堂举行总理周年纪念会上，戴笠发表公开谈话说：

“我们团体有×万×千人，在工作上有共同信守的原则，效忠国家，效忠领袖，坚定革命信念，确认革命立场，达到共同目的。这便是共同纲领。我个人承领袖耳提面命，担当抗日的重任，我自己所负的责任不容许我马虎，我们调查统计局的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重要一环，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意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有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3月17日，戴笠乘航空委员会所派专机南飞重庆，途中因气候恶劣，在南京上空失事。戴笠及其随行13人全部摔死于江苏省江宁县板桥镇戴山。

蒋介石闻讯，悲痛至极，柱着手杖，爬上南京中山灵谷寺，亲自为戴笠挑选了墓地，赠以“碧血千秋”花圈，挽联文曰：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戴笠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追赠他为陆军中将。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恩宠有加，是国民党的其它要员无法比拟的。这正好证明戴笠一生“忠于领袖”，甘愿做“小人物”的办法，是卓见成效的。

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的变调曲就是：“我是给人家抬轿子的！”让人听起来的似乎有满腹心酸的感觉，但，轿子可以不去抬，抬轿者可以是别人，为什么恰好是你呢？

蒋介石两手政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清脆的枪声打破了西安的平静，震撼了中国和世界。

西安事变爆发了。这天早晨，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在苦谏，哭谏蒋介石抗日不得之后，发动了兵谏。

几年前，笔者到西安之郊临潼华清池，看到一个古老的房屋的窗户上，里外两层玻璃内夹着一层布有弹孔的玻璃。这里就是当年蒋介石的居所。穿过这间房屋向山上走去，半腰有一个水泥铸就的亭子，亭子上横书“兵谏亭”3字。据说，这里原叫“捉蒋亭”，80年代后，随着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日问题的重新评价和海峡两岸统一的需要，改为“兵谏亭”。亭子后有几块巨石，石中有缝可容人。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从居室逃出后，只穿着单裤跑到这里，藏匿其中，被东北军官兵“请进西安城”。笔者到此地时，游人熙熙攘攘，争着抢着在这个石缝中摄影留念，似乎想体验一下蒋介石当年的心情。

蒋介石被捉后，张学良找他谈话，劝他接受关于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但蒋介石固拒不纳，愤怒地说：“你是我的敌人，我不跟你说话，你枪毙我好了。”张学良亦无可奈何。后经与蒋、张关系均十分密切的澳籍顾问端纳穿针引线，宋子文又亲到西安见张学良，双方才开始磋商有关和平解决的问题。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的一个生死关，也是对蒋介石亲信部下的一次严峻考验。十三太保中的“政治领袖”贺衷寒，就是因为在这次事变中追随何应钦，发动黄埔系将领通电“讨逆”，而后大遭冷落。而戴笠却因为在这次事变中“舍身救主”而备受宠信，势力大张而终身不衰。

且说蒋介石被扣西安时，戴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广东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闻讯

大惊，急忙遑返南京。没想到，一回南京，立即受到多方攻击和责难——你身负护卫领袖安全重任，西安方面的异常动向，为何不能及时掌握，致发生今日之事？领袖被扣，生命艰危，这个责任你如何担负得起？各种责难纷至沓来，甚至有人赞成“应杀戴笠以谢天下”。戴笠也确实难以招架。不过，说戴笠手下的特务对西安的动向一无所知，也不尽然。

当时，戴笠部属王抚洲担任西安“剿匪”总司令部的代理党政处长，就住在张学良公馆旁边的一栋楼房里，并处理四维学会的工作。当东北军与共产党接触时，他曾对“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说过：“副总司令认定中央某些人压迫他，共产党又说让东北军剿匪是消灭东北军。现在东北军损失两个师，中央最好给东北军补充，至少先补充一个师，以事实来纠正张副总司令的观念，粉碎共产党的宣传，否则会发生大问题。”特务处其它一些人也将张杨的一些可疑动向报告过特务处，而且由特务处上报蒋介石。在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一文中也说：“中正二次入陕之先，即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进退自由等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谋与叛乱者。……”只是蒋介石以为用委员长的威严就能“统一军心”，故仍去西安，终至被扣。

但是，戴笠毕竟是蒋介石安全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他又是由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特务处的所有工作都是承蒋介石之命而行，早已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妒忌。戴笠思来想去，深觉此时此刻，必须拿出性命一搏。如果没有特殊表现，蒋介石回来，自然自己要首当其罚；万一蒋介石回不来，自己也难辞其咎，一旦其它派系掌权，甚至会身首异处。左右一死，与其退缩苟安，不如死个壮烈，留个忠主之名。而且据各方面情报看，张学良未必杀蒋，自己与少帅又素来交好，只要他不杀蒋，就未必能杀我。如果能与蒋活着回来，就可得个舍身救主的英名，蒋委员长也势必刮目相看。他想起当年组建特务处时对蒋介石表的忠心：从受命之日起，我这颗头就算交给校长了——干得不好，校长要杀我；干得好了，校长的敌人也必然要杀我。今天就是考验自己忠心的时候了。

12月21日，端纳、宋美龄、宋子文决定第二天飞赴西安，戴笠也随机前往。

此事定下后，他回到鸡鹅巷，整理有关文件。次日临行前，他召集部下话别，慷慨激昂地说：“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去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只有以死谢罪。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国家之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重任，就全在各位肩上了……！”

他的话未完，一些部下已泣不成声，甚至有的大哭起来。戴笠说：“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都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负。我戴某既然以身许国，忠于领袖，就无可惧怕之事。只要能仰俯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古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修养。我自信尚有此修养，大家应该为我此行高兴才是。我不要大家以眼泪为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声助我行色。”特务们这时才无可奈何地鼓起掌来。

回到鸡鹅巷，他一进门，就跪在蓝老太太面前哭泣着说：“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奉，未尽孝道，愧为人子！……今因要事，将要远行，尚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唯望老母保重，勿以儿为念……”

戴母年轻守寡，饱受磨难，也深知儿子的工作性质，要干的事十分危险，不忍再增加儿子的压力，抚着他的头说：“我从年轻守寡，抚养你成人，尝尽人间辛苦。今天看到你能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内心也感到高兴。只要你能竭力尽忠，又有这份孝心，我也就放心了。我虽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好，如果有什么不方便，我会携带你媳妇和儿子回乡下住。你不要以此为忧，快起来，忙你的去吧！”

当天下午，戴笠随宋氏兄妹和端纳，乘专机到达西安。到西安后，宋美龄等被安排去见蒋介石，戴笠却被张学良的警卫安排到张公馆的地下室，枪也被缴去了。戴笠被关在地下室里，心里十分担忧，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谁也无法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事，想到下飞机前，

宋美龄曾将一把手枪交给端纳，对端纳说：“请你答应我，如果有士兵污辱我，你就开枪打死我！”连国母都有这样的准备，何况自己一个小小的戴笠！

他思来想去，无法成眠，等到第二天，仍无任何消息，乃拔出笔来，在日记里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 12 日后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正当戴笠生死难测之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磋商正在紧张进行。宋美龄一下飞机，就被送去见蒋介石。一见夫人进来，蒋介石就哭着说：“我知道你要来的。早上我在《旧约全书》上读到，耶和華要做件新事，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宋美龄不再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小手绢蒙住脸，两个肩膀抖动起来。

第二天，12 月 23 日，在同西安的将领作了一番长谈之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他相信他快有办法使蒋委员长早点获释了。但夜幕降临时，情况又变了，张学良带来一个计划，说他想将蒋介石化装，用车子送到自己部队的驻地，而端纳和蒋夫人先飞回洛阳，随后在那里与蒋会合。但宋美龄反对这个计划，希望蒋能不失尊严地离开，而不是像个罪犯。

后来，张学良提议，安排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宋美龄进行了长时间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的一致看法。迄后，周恩来又同蒋介石直接面谈，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蒋介石也表示：我们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最后，答应以人格担保，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并保证要“言必信，行必果”。周恩来当时回复毛泽东的电文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并积极开展各方面的疏通工作，说服西安将领同意释放蒋介石。

24 日下午两点，周恩来说服了杨虎城，决定释放蒋介石。

放蒋的大计已定，张学良才到地下室和戴笠见面，张学良拿出一份东北军、西北军官兵联名的报告递给戴笠，上面赫然是：“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张学良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们无加害委员长的意思，也就不想杀你。我是怕部下伤害你，才派人把你送到公馆地下室，保护起来。”

24 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将领坐陪外，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出席，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及蒋的随行人员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也从惊恐中镇定下来，重新露出了笑容。

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了，张学良陪送，一到南京，就被戴笠派人监视起来，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而戴笠却因舍命救主备受宠信。

这是后话。

戴笠之所以能够临危赴难，除了他从与蒋介石的关系，从种种利弊关系的角度权衡之外，与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和训导，与特务处拱卫蒋介石安全的职责也是密不可分的。

蒋介石对其部下的要求历来是要忠于他个人，效力他个人。他在《第二期革命之开始》训词中讲道：“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领袖对于党的一切，党员的一切也要一肩担负起来！每个党员的精神与生命，完全与领袖是整个的不可分的。”并且为了“领袖”要不惜牺牲。他在《向最危险的方向前进》的讲词中说：“不成功即成仁，我所最快活的也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打了胜仗，土匪被我们消灭了，我们主义能够实现，这就是成功，我们当然快活！第二件就是我们自己在阵中牺牲了，就是成仁！”誓死效忠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是蒋介石对其亲信部下的谆谆训导。而这一点，在蒋介石的亲信部下，特别是力行社，特务组织中都是以铁的纪律来规定的。戴笠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最早、最直接、最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得到蒋的恩宠。

从特务处的职责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蒋的安全。早在 1926 年入黄埔不久，在一次同学聚集之时，别人都纷纷阐述自己的理想，不外乎英勇战斗，当一名高级军官，指挥千军万马，威风八面等等，独戴笠沉默不语。大家追问再三，他才闪烁其辞地说：“我无大志，但愿毕业之后，为校长作一名侍卫，保护他的安全。”戴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戴笠在杭州骑兵营得知蒋介石到了上海，就跑过去，虽无晋见之阶，仍千方百计打听到蒋介石的住地，自愿地到蒋在上海的寓所门外站岗，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迨特务处成立后，蒋介石的警卫就由这个处负责了，其组织人员自然由处长戴笠调派。

特务处成立不久，即成立警卫股，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1932 年秋，戴笠帕特务处执行科科长邱开基赴武汉，负责警卫蒋介石。邱开基到武汉后，即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当时武汉的社会状况很乱，特别是帮会势力极强。帮会的首领就是武汉绥靖公署的稽查处处长，警察局的侦缉队也在帮会的控制之下。邱开基到任后，首先撤销了稽查处，让帮会首领成立了一个道德善堂，将帮会分子全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次，委派手下担任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将治安大权全部抓在特务处手中。第三步就是抽出一部分款项，在码头、工厂、旅馆、餐馆等公共场所、妓院等地设置眼线，提供情报。第四步就是组织一个秘密锄奸团，专门从事密捕、绑架、暗杀等活动。这些措施一方面是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针对一切不利于蒋介石统治与安全的各种势力。

1933 年 7 月，特务处专门成立了一个随节工作组，派黎铁汉为组长，专负保卫之责。这个组织，以后扩大为特别警卫组，作为一个常设机构，随同蒋介石行动，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也常常戒备各方势力的行刺。而“戴氏深知，蒋公一身系国家安危，保卫领袖，如护头目，为无比重要之事，乃引以为己任。他要求所属工作人员，将保卫蒋公安全，列为第一重要任务，不许有片刻懈怠。”

据有关方面统计，1934 年至 1936 年，曾发生过 4 次谋刺蒋介石的事件，均被戴笠的特务处侦破，将主要人员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捕获。

为蒋介石警卫，就要随蒋介石行动，有时，蒋介石心血来潮，甘冒奇险，警卫人员也自然要随之涉险。

1938 年 6 月，日军进攻武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蒋介石坚持在武汉指挥战斗。10 月 25 日，日军到达武汉，并展开猛烈进攻。武汉城内炮声震耳欲聋，炮弹、飞机扔下的炸弹不断在城内爆炸，境况确实十分危急。正是在这一天，蒋介石的飞机才从武汉起飞，赶往南岳。也正是这一天，日军占领了武汉。临撤出前，蒋介石命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而这个破坏又是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的。

戴笠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在蒋介石走后，继续留在武汉，部署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事宜。他领着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和稽查处处长赵世瑞巡查了全城的 30 多个爆炸目标，并在当晚召开了一个爆破工作会议后，才离开武汉。这时，日军已开始攻击武汉城，戴笠一行想乘车离开，但道路已被日军堵死，乃改乘一小船，从日军包围的缝隙中钻出。

戴笠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也确实煞费苦心。这一点，从抗战后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的活动中，看得最为明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北平，蒋介石决定 12 月到北平视察，戴笠先行安排。当时，北平刚刚从日伪统治下收复，人员极其复杂，戴笠深恐万一出现什么不测，使蒋介石受惊，于是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他多次召集北平的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文强和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密议，决定急调亲信特务祝维屏，由戴笠保荐为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以便直接指挥、运用北平的全部警力；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指挥刑警大队直接参与行动；汉中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倪超凡飞北平，任北平市警备

司令部稽查处长。三方紧密配合，协同负责蒋介石安全。直接负责蒋介石安全的是一个贴身内围的警卫大队。所谓贴身内围，就是蒋介石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紧贴蒋介石的周围，贴身警卫，以备不测。戴笠亲自选调黄埔 6 期的老牌特务严家诰任大队长，调在中美合作所所属的重庆特警班内受过美国特务教官严格训练的学员 200 多人，乘专机飞北平。在蒋介石到北平前即与宪警配合，进行特殊训练。戴笠亲自出马指点，考核队员的思想状况和技术水平。

1945 年 12 月 11 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飞到北平，住在交道口圆恩寺内。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军、宪、警、特里三层外三层的布置起来。

蒋介石一到北平，俞济时便将蒋在北平活动的日程交给戴笠，由戴笠逐日安排有关警卫事宜。戴笠这个人十分懂得保密的重要。他按日程规定，只将隔日的行动计划预告罗家诰，对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宪兵团长等都是直接布置任务，并不详告蒋介石的具体行动。这样，既做到了绝对保守秘密，又增加了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在北平共停留 8 天。其间先后接见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熊斌、张廷谔等人，举行了北平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茶话会，和招待中外人士、新闻记者等活动。最紧张的一幕是 16 日检阅美军驻北平陆战队和在太和殿召集全市大中学生集会并讲话。为了保证这一天不出问题，戴笠与俞济时商量了一夜，决定布置四道警卫圈——第一圈摆在蒋介石讲演台的周围，由严家诰率贴身警卫大队警卫，戴笠亲自指挥；第二圈是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的数十名武功超绝，能飞檐走壁的“燕子李三”式的刑警，隐身在故宫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窥侍动静，随机出动；第三圈是军统北平站的全体特务，化装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观察警戒，且编成群组，随时策应；第四圈才是从北平市驻军中挑选的士兵，担任外围警戒。

这一决定立即报告了蒋介石。俞济时夸奖戴笠说：“老头子一见你在，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

16 日这天，戴笠早早就赶往故宫亲自安排。他自到北平，一直身着美式军装，佩中将军肩章，胸前挂满勋标，威风赫赫。这一天，忽然改换灰黑色中山服，头戴宽边大礼帽，帽沿压得低低的，口袋里装了两枝马牌左轮手枪，压满了子弹。

蒋介石检阅完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走进挤满了人群的太和殿，站在台上，操着浙江口音大讲民族复兴，“三民主义”，军政统一，等等。戴笠、俞济时和贴身队员站在人群的前排，围成一个保护圈。戴笠两手插在口袋里，紧握着枪把，一直紧张地注视着动静。蒋介石不时看着戴笠的大礼帽，心定神安，不禁慷慨激昂起来……

不料，蒋介石讲完后，人群忽啦一下子涌向前来，戴笠站脚不住，被人群挤开了，贴身警卫也被冲散。亏得李宗仁、孙连仲、黄仁霖等人手拉手把蒋介石护在中间。贴身警卫也马上又挤过来，护在李宗仁等的外围，这才冲出一条路，把蒋介石护送上车，离开故宫……

戴笠回到住处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打电话给文强说：“老头子很高兴，谢天谢地。老头子有令，所有护卫出力人员一律有赏，你给我传达一下。”

实际上，戴笠只是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次来北平，蒋介石夫妇游了一次颐和园，戴笠又忙得不亦乐乎。他东奔西窜，西支东指，把严家诰等手下驱使得晕头转向。

到了 18 日，蒋介石终于走了。走前，指示戴笠安排好北平肃奸工作，戴笠又由诚惶诚恐的紧张转入作威作福的繁忙……

陈果夫称病留余地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抗战爆发，8 月上海抗战再起，战事沿京沪铁路逐渐向西扩展，各地秩序，日渐混乱，到处人心惶惶。12 月 23 日，江苏省召开政府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撤